

# 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 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吴愈晓 黄超 黄苏雯

**提 要：**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 学年基线数据，本文探讨了文化资本对初中学生学业成就的效应在不同阶层之间和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文化资本存量越丰富；（2）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面效应；（3）文化资本的效应存在阶层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4）文化资本的效应还受到就读学校质量的影响，在越优质的学校就读的学生，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以上结果表明，“文化再生产模型”而不是“文化流动模型”更适用于理解当前中国文化资本对教育成就和地位获得的影响。而且，由于高阶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进入质量较高的学校就读，因此文化资本的效应在当前中国是一个“双重再生产”过程。我们认为，文化资本作为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与中国居民地位获得和社会不平等结构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关键词：**文化资本 文化再生产 文化流动 学业成绩 教育不平等

## 一、导 言

文化资本是理解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强有力的理论概念。近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解析文化资本与我国社会不平等结构之间的关联。在涉及文化资本的诸多议题中，文化资本如何形塑教育不平等吸引了很多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分析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抽样调查数据，吴愈晓（Wu，2008）发现，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文化资本较为丰富的个体在教育获得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资本对各教育阶段的升学机会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后还有一些研究也探讨了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学业成就和地位获得等诸多变量

的影响（仇立平、肖日葵，2011；方长春、风笑天，2008）。这些研究基本印证了布迪厄和帕瑟隆（Bourdieu & Passeron, 1977）的论述，即文化资本是上层群体将其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的重要机制之一。

在使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探讨我国教育不平等议题时，已有研究还存在两个尚未明确的理论命题。首先，当前研究基本都是沿着布迪厄的思路，致力于比较不同阶层群体在文化资本存量方面的差异，进而用文化资本存量差异去解释教育获得或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然而除了文化资本存量以外，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效应的阶层差异同样值得关注。文化资本究竟更有利于上层群体还是下层群体？或者说，在中国社会，文化资本作为个体拥有的特质或“惯习”，究竟是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代际再生产，还是为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一种手段或方式？其次，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中，学校是文化资本转化为学业成就的重要场域。不同国家的研究表明，文化资本能否转化为学业成就与特定的教育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那些欣赏学生文化资本禀赋的学校或教育体制才能实现这种转化（Byun et al., 2012；胡安宁，2017）。在教育体制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形成了迥然有别的学校环境，最重要的一个表征就是因历史原因或当前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的学校之间的质量差异。学校也是分层的，不同学校在硬件设施、管理、师资、升学率和办学声誉等诸多方面高度分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文化资本的效应可能因学校而异。究竟哪些学校更有助于文化资本转化为学业成就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经验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学校对社会不平等结构会产生何种影响。

囿于数据限制，学校因素在我国社会不平等研究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这使得我们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之一——学校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社会不平等——无法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经验检验或理论探讨。在国外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脉络中，学校在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一方面，教育哲学和功能论者认为，当代教育系统建立在平等主义理念之上，每个个体都应该得到相同的教育机会，因此学校应当是降低社会不平等的机构，扮演着筛选人才和平等器（equalizer）的角色；另一方面，布迪厄、阿尔都塞（L. Althusser）、鲍威斯和金蒂斯（Bowles & Gintis, 1976）等冲突论学者认为教育系统或学校并不会带来社会的平等化，相反它们是合法化不平等的机构。优势阶层通过系统地灌输或宣扬自己特定的规则、文化品位或意识形态实现不平等的再生产。与理论分歧相对应的是经验研究发现的不一致性。有些研究认为，教育不平等是在学校之外的教育过程（如暑期补

习) 中产生的, 学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校外产生的不平等, 因而弱势家庭的学生相比优势家庭的学生可以从学校教育中受益 ( Raudenbush & Eschmann, 2015; Alexander et al. , 2007; Downey et al. , 2004)。另有一些研究则认为, 学校教育通过能力分班 ( ability grouping) 和学轨 ( tracking) 等方式再生产不平等 ( Gamoran & Mare, 1989; Oakes, 1985)。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 学生最初的劣势或优势不断累积, 从而差异不断扩大 ( Baumert et al. , 2012; Potter & Morris, 2016)。这些不一致的理论观点和经验发现使得我们有必要去思考并检验在市场转型和教育制度变迁的背景下, 中国的教育体系和学校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本文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背景, 致力于回答以下几个具体研究问题: 第一, 文化资本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 第二,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文化资本是否有显著的回报? 第三, 文化资本的回报是否存在阶层差异? 第四, 文化资本的回报是否因学校而异? 通过回答以上问题, 不仅可以检验文化资本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下是否作用于个体的教育成就, 而且可以了解文化资本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 二、文献回顾: 文化资本及其效应异质性

### (一) 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源于他对学业成就差异的考察。他发现, 相比个体的天赋或能力, 从家庭环境中获得的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借助文化资本这个概念, 布迪厄建构了社会再生产理论, 即家庭社会化过程和学校教育系统通过不同阶层群体文化资本分布结构的再生产来实现权力关系和符号关系结构的阶层再生产 ( Bourdieu, 1977)。这个过程的基本逻辑如下: 优势阶层的子女在进入学校时相比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具有文化资本方面的优势。虽然后者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优势阶层的一些文化资本, 但他们始终不会像优势阶层那样对这些文化资本具有很高的熟悉度和掌握程度。同时, 学校并不是一个社会中立的机构, 而是体现了优势阶层的经验, 因此优势阶层的孩子会因为他们掌握文化资本而得到学业方面的奖励或回报, 而弱势阶层的孩子则会因为他们缺乏文化资本或者对文化资本的掌握不佳而处于不利地位 ( Lamont & Lareau, 1988)。

用文化资本理解社会再生产时，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结构性因素非常重要。家庭社会化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个过程。在家庭生活中，个体获得了各种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如语言表达模式、文化意识、态度偏好等一系列性情或惯习 [dispositions/habitus]），也包括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如书本、艺术作品等文化产品）。这些文化资本的分布是高度阶层化的，只有优势阶层才能在社会化过程中将特定的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或通过各种经济资本的投入丰富子女的客体化文化资本。总之，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环境）是文化资本分布结构最重要的成因。

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二个过程发生在学校环境中。如果说家庭环境形塑了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那么学校则把这种内在差异外化为学业成就的阶层差异（Bourdieu & Passeron, 1977）。通过对法国学校的考察，布迪厄发现在写作考试和口试中，老师通常会对持有特定语言风格（language style）的学生给予更高的分数，而这些学生通常出身于优势阶层家庭。借助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布迪厄总结出学校的三个功能：一是实现文化传承，这是学校最重要的功能；二是实现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强化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结构；三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合法化。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是扩大社会不平等而不是缩小社会不平等的机构（Swartz, 1997）。

## （二）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

### 1. 阶层异质性

文化资本的分布结构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将传递给子女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对文化资本进行投资，使其得到积累（Bourdieu, 1986: 252），这样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就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观点也因其带有某种程度的决定论倾向而受到一些批评。按照文化资本理论的逻辑，个体一旦出生在优势阶层或弱势阶层，那么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就已经确定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在阶级界限比较清晰的法国社会，这种理论逻辑是成立的；但是美国学者认为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模式在美国社会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对而言，美国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它拥有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其文化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和族群多样性，阶级文化亦不太明显（Lamont & Lareau, 1988）。因此，美国学者接受“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同时认为文化再生产模式在美国社会并不那么有效。

迪马济奥（DiMaggio, 1982）较早关注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流动模型

(Cultural mobility model)。他从韦伯“地位文化”的论述中得到启发，认为市场的兴起销蚀了阶级边界，导致现代社会中地位文化的阶级界限不甚分明，地位获得将成为一个文化过程。在流动性较强的社会中，童年经历和家庭背景对文化资本存量的影响甚微，积极获取优势地位文化（prestigious status cultures）对低地位群体而言是有效的地位获得和向上流动途径。迪马济奥将参与优势地位文化活动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并且发现它会对个体的学业成就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低地位群体更能够从参与优势地位文化活动中获益。此后也有研究验证了文化流动模型的正确性，证明了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效应在低地位群体中更大（Aschaffenburg & Maas, 1997; Dumais, 2006）。

在文化流动模型中，文化资本并非如布迪厄所言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机制。相反，低地位群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参与高地位文化活动积累文化资本从而实现向上流动。由此看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文化资本对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一种是复制甚至扩大社会不平等（文化再生产理论），另一种则是提供向上流动的通道从而缩小不平等（文化流动模型）。要验证文化资本究竟起何种作用，关键在于考察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效应在优势地位群体中更强还是在低地位群体中更强，亦即回答文化资本效应的阶层异质性问题。

## 2. 学校异质性

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流动模型的差异说明，文化资本的作用依社会情境而改变。法国和美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存在差异，文化资本作用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讨论文化资本及其效应时，应该把文化资本放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教育系统中加以动态地理解，而不能仅仅凭文化资本本身的性质来解释。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地位控制和权力分配机构，教育系统（学校）是文化资本得以发挥作用的空間。一系列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教育系统因其特征不同，文化资本的效应也会产生差异；而同一国家的教育系统中，内部存在的课程、同辈群体构成、教师水平差异，以及学轨分化也会对文化资本的效应产生影响。

在迪马济奥等研究者证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确有影响的同时（DeGraaf et al., 2000; DiMaggio & Mohr, 1985; DiMaggio & Useem, 1978; Dumais, 2002; Xu & Hampden-Thompson, 2012），另一些研究者发现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影响有限或者影响模式有所不同（Byun et al., 2012; Yamamoto & Brinton, 2010; Katsillis & Rubinson, 1990; Rubinson & Garnier, 1985）。已有研究对不同国家文化资本效应的差

异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考虑了教育分流的影响。在教育分流较早的国家，学生在学业生涯早期就被安排在不同的学轨。在同一学轨中，文化资本在学生中的分布差异很小，因此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有限。相反，在教育分流较晚的国家，学生掌握的文化资本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大（Andersen & Jæger, 2015）。第二种解释则关注教育制度的差异。关于韩国和日本的研究都表明，东亚地区强调规范化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考试设置以及以考试成绩为基本标准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这种教育制度削弱了特定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Byun et al., 2012; Yamamoto & Brinton, 2010; 胡安宁, 2017）。

除了在不同国家和教育体制中存在差异外，在同一教育体制中，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效应也存在差异。例如，安德森和耶格尔（Andersen & Jæger, 2015）利用PISA数据分析了三个国家（加拿大、德国和瑞典）的文化资本效应，发现文化资本在成绩较差（且方差很大）的学校效应最强，而在成绩较好（且方差较小）的学校效应较弱。亦即，那些就读于质量较差以及学校阶层构成较低的学校中的学生，他们掌握的文化资本能够更加有助于提升学业成就。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成立。一项关于巴西的研究表明，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环境下，高质量私立学校中学生的文化资本可以得到更多的教育回报（Marteletto & Andrade, 2014）。以上两项研究表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校环境，一种学校环境能够使得文化资本帮助低地位群体提升学业成就，起到缩小不平等的作用，另一种学校环境则使得文化资本帮助优势地位群体进一步提升学业成就，起到扩大不平等的作用。区别这两种学校环境方式就是考察文化资本效应的学校间异质性，亦即考察哪种学校环境更有利于文化资本转换为学业成就。

### 三、阶层分化、教育制度与文化资本的双重再生产

考察文化资本与学生的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需要引入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概念。场域（field）是布迪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spatial metaphor），它是指不同社会位置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或结构，不同位置之间的权力或资本差异以及关系类型将会对占据这些位置的个体或机构产生客观影响（Bourdieu & Wacquant, 1992）。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探讨文化资本是否或如何作用于个体的学

业成就，需要考虑两个场域：其一是学生所在的家庭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它不仅决定了学生个体拥有的文化资本存量，而且还影响文化资本转化成为直接有利于学业成绩的能力高低，亦即是说，不同阶层的学生的文化资本回报可能有显著的差异。其二是学生所就读的学校在学校分层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学校是学生接受教育和考核或选拔的场所，也是个体拥有的文化资本能否被转化为学业成就的地方。众所周知，因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学校体系也是分层的，最直接体现为“优质”（名牌）学校和一般学校之间的区别。处于分层体系不同位置的学校在学生选拔、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以及考核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可能影响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即文化资本回报率因学校的不同而不同。

#### （一）当前中国的阶层结构和文化资本的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等力量的推动下，我国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从计划经济阶段的再分配体制逐渐转向市场化分配体系，从而导致中国居民的收入分化程度日益加深；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证券、资本和住房等领域改革的深入，加上财产的积累过程，我国居民的财富分化程度也日趋扩大。简而言之，社会成员之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阶层差异。已有的几项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模式的研究均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陆学艺（2002）的“十大阶层模型”、刘欣（2007）的城市阶层地位划分模式还是李路路等人（2016）提出的“权威阶级体系”，都表明我国的阶层结构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模糊的“两阶级一阶层”（工人、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模式向更复杂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转换。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现代社会分层体系内含两种资源的分化，其一是经济资本（财富、收入和财产）的分化，其二是文化资本（知识、教育文凭）的分化（Swartz, 1997）。不同资本形式之间可以实现转化，有丰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更可能向子女投入更多文化资本，他们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文化物品或支付更多的高雅文化活动。而且，高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本身的教育获得更高，自身对文化资源和高雅文化消费有更多的需求，从而能为孩子营造更好的文化氛围。具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不仅可以凭借经济资本帮助孩子入读更好的学校、参加课外补习（影子教育），也可以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客体化文化资本（如配备电脑、互

联网和家庭藏书),还可以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传递给孩子(如良好的学习习惯等)。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则更加缺乏上述文化资本。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随着阶层结构的分化,不同阶层或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文化资本存量存在差异。故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文化资本的存量越多。

## (二) 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作用

在阶层分化趋势明显以及阶层边界日渐清晰的过程中,社会(阶层)流动问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大众关于各种“二代现象”的热议以及社会分层和流动领域的学者关于“阶层固化”的研究和争论便是很好的例证。教育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机制之一,不同阶层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日趋重视。对于优势阶层而言,教育是维持阶层地位避免向下流动的主要方式,而对于非优势阶层而言,教育更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基本渠道。总而言之,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对子女教育投资持续加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趋向白热化,目的是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学业成绩从而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系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问题,学校之间的分化越发明显。在基础教育阶段,虽然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明文取缔,但是许多原来的重点学校仍然以各种不同的名称或形式存在,经费和师资等教育资源仍向这些学校倾斜,加上近年来因为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的“学区房”现象,使得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加剧。以高价购买学区房或缴纳数额不菲的“赞助费”等各种形式争夺名校入学资格的情况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

另外,自1996年国家文件正式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使应试教育转为全面素质教育”<sup>①</sup>以来,各级学校尤其是优质学校开始重视素质教育。但是在中国,“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一直是矛盾的结合体,虽然强调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但是最终仍要落到升学的指标上,这不仅是因为人才选拔的要求,更关乎学校的声誉和生源质量(葛新斌、李罡,1998;杨东平,2016)。在实践层面,素质教育的内

---

<sup>①</sup> 参见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提倡素质教育的内容在文件的“科教兴国战略”部分。



容往往与考试或选拔融为一体，甚至是前者为后者服务，具体的表现是在平时考核和升学考试纳入“素质教育”的内容。许多优质学校在招生的时候有面试的环节，考察的是课本之外的“综合素质或能力”；有的学校甚至要求候选人有“琴棋书画”等方面的特长，或者通过为文化特长生加分的方式选拔学生。总而言之，基础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往往和学生的文化素养、见识或特长高度相关，而这为文化资本转化为学业成绩或升学机会提供了用武之地。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年来兴起的高等教育自主招生政策，即高等院校自行组织考试来选拔学生的实践。自主招生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变原来单单通过标准化的高考分数来录取学生的方式，通过更为灵活开放方法录取一些综合能力全面或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但是，自主招生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招生方法，而是和高考结合在一起的。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仍要参加高考，只不过是在自主招生选拔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降分录取或者专业任选的资格。在具体的操作环节，自主招生考试的内容注重的往往不是课本的知识，而是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和知识面或某些方面的特长，而这些素质或特征往往和学生家庭所掌握的文化资本密切相关，亦为文化资本直接转化为有利于获得升学资格创造作用空间。

总之，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学校等级分化明显和社会流动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结合不改变“应试教育”作为人才选拔主要方式但又日益强调“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我们认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有利于提高学业成绩或升学机会的手段，其作用会越发重要。在最新的一篇综述文章里，胡安宁（2017）亦认为“文化资本在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勾连家庭背景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的一个强有力的中介因素”，并进一步指出在未来的教育或社会分层问题研究中，文化资本的效应将日益显现。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文化资本显著作用于学业成就，文化资本存量越多的学生，学业成就越高。

### （三）家庭、学校与文化资本的双重再生产

如前所述，文化资本在家庭和学校两个场域作用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家庭所在的阶层地位不仅影响文化资本的存量，而且影响文化资本的作用。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因为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为孩子购买更多的文化物品（如书籍和文化用具等），创造更多参与高雅文化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本身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文化习惯，在家庭中形成特定的文化氛

围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更为重要的是，在阶层分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高阶层群体在阶层结构中既有向上流动的积极动力，又有规避向下流动的风险，而且他们更能体会到学业成就和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会积极帮助自己的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与低阶层家庭相比，高阶层的家长更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过程，更多参与到“家校联系”等活动，更主动而且更有能力了解学校的有关教育（培养和考试）政策，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好的学业成绩（Lareau, 2011）。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阶层地位越高的家庭能够更好地利用文化资本这种手段，帮助孩子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获得成功。简而言之，文化资本的效应存在阶层差异，阶层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孩子的文化资本回报越高。这也是布迪厄所主张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即：

假设3（文化资本的阶层再生产假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越强。

若用家长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政治资本、城乡户口等四个以往研究较常使用的指标测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则可以提出如下几个具体的研究假设：

假设3a：家长职业地位越高，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

假设3b：家长教育程度越高，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

假设3c：家长政治资本越多，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

假设3d：城市户口学生群体，文化资本的回报较高。

另外，文化资本的效应还会受到学校的形塑。如前所述，当前我国的学校系统也是高度分化的，有优质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的区分。为了吸引和培养综合素质更高的学生，优质学校往往在招生和教学中更加强调“素质教育”，这与许多高阶层家长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以考试成绩为升学标准，所以素质教育的内容最终还是要体现在考试成绩中。优质学校的培养和考核往往会融入更多课外知识，这恰好为文化资本提供了“用武之地”。换句话说，文化资本在较优质的学校往往更能得到认可或欣赏，能够更好地将学生的文化资本转换为学业成就。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文化资本的学校再生产假设）：越优质的学校，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越强。

已有的研究表明，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存在明显的阶层隔离现象，即高阶家庭的孩子往往集中在更优质的学校当中，反之亦然（吴愈晓、黄超，2016）。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学校中学生的阶层构成来测量学校的质量。此外，我国教育资源长期以来存在城乡分配不均现象，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城市的中心位置，因此我们还可以用学校城市学生比例和学校城乡区位来衡量学校优质与否。总之，学校中间阶层比例、学校城市学生比例和学校区位是除了办学质量以外，学校优质与否的很好的替代性测量。基于此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具体的研究假设：

假设 4a：学校中间阶层比例越高，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

假设 4b：学校城市学生比例越高，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

假设 4c：办学质量越高的学校，文化资本的回报越高。

假设 4d：位于中心城区的学校，文化资本的回报较高。

如果假设 3 和假设 4 成立，则表明在当前中国，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或教育获得的影响就是一种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再生产”模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可以将文化资本更加有效地转换为学业成就，而且他们往往有能力将孩子送入优质学校；而在优质学校中，文化资本又能够被更好地转换为学业成就。也就是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系统先后强化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尤其是当前分化的学校系统，非但没有缩小文化资本分布结构的阶层不平等，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因家庭背景导致的文化资本差异，实现了第二重再生产。由此可见，文化资本对中国未来社会分层结构将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其双重再生产模式将蕴藏着阶层固化或扩大社会不平等的风险。下面，我们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来验证文化资本的双重再生产模式。

## 四、研究设计

### （一）数据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 CEPS）。<sup>①</sup> CEPS 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年级（七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作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

<sup>①</sup> 关于 CEPS 数据的详细信息，参考王卫东（主编），2016，《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成比例 (PPS) 的抽样方法, 从全国随机抽取 28 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 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中的 438 个班级进行调查, 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 学生样本量为 19487。在对变量进行处理并且删除缺失值后, 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18979。

## (二) 变量

### 1. 结果变量: 学业成就

本研究通过被访者 (学生) 的认知能力水平、期中考试成绩和对主干课程 (语文、数学和外语) 的接受能力等三个指标来测量学业成就。CEPS 为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分别设计了一套认知能力测试题, 测量学生的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 我们使用每个学生的得分作为认知能力水平的测量。考试成绩是每个学生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期中考试成绩的总分。关于主干课程的接受能力, CEPS 设置了三个问题询问学生语数外三门课程“目前学起来是否吃力”, 每个问题对应四个选项, 1 代表“特别吃力”, 4 代表“一点也不吃力”, 把三道题的答案加总, 得到取值为 3—12 的连续变量, 数值越大表示学习过程越轻松。为了数据分析的简约性, 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上述三个指标的公因子, 并且通过 0—1 标准化构建了取值为 0—100 的学业成就变量, 数字越大表示学业成就越高。

### 2. 核心自变量: 文化资本

根据文化资本的定义 (Bourdieu, 1986) 和常用的操作化方式, 我们使用家庭文化资源以及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文化活动的频率来测量文化资本, 前者代表客体化的文化资本, 后者代表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其中, 家庭文化资源包括家庭的藏书情况和文化设施情况 (包括是否配备独立书桌、电脑和互联网)<sup>①</sup>。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文化活动是指参观博物馆的频率和阅读的频率<sup>②</sup>。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藏书变量、文化设施变量和文化活动变量提取公因子, 标准化后得到一个取值为

① CEPS 询问学生“你家里的书多吗?” 对应五个选项, 取值 1—5 分别代表很少、比较少、一般、比较多、很多, 我们把它命名为藏书变量。CEPS 询问学生“是否拥有独立书桌”, 1 代表有, 0 代表没有; 询问学生“是否有电脑和网络”, 0 代表无电脑和网络, 1 代表有电脑无网络, 2 代表有电脑和网络。我们把“书桌”和“电脑网络”加总生成取值范围为 0—3 的文化设施变量。

② CEPS 询问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和参观博物馆的频率, 每道题均对应六个选项, 1—6 分别代表从未做过、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个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以上, 两道题加总生成取值范围为 2—12 的文化活动变量。

0—100 的文化资本变量，数字越大代表父母的文化资本投入越多或学生文化资本存量越丰富。

### 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学校类型变量

本研究使用家长职业地位、家长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户籍身份等四个指标刻画学生的家庭背景，这四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职业地位变量取值为 1 表示家长从事管理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类（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业，取值为 0 表示从事其他所有职业。教育程度变量取值为 1 表示家长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取值为 0 表示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党员身份取值为 1 表示家长是中共党员，取值为 0 表示非中共党员。户籍变量取值为 1 表示目前为城镇户口，取值为 0 表示当前为农村户口。

学校类型变量包括学校的学生阶层构成、学校的城市学生比例、学校质量排名、学校区位等四个变量。其中，学校的学生阶层构成是指每所学校内学生家长是从事管理类和技术类职业（即中间阶层）的比例；学校城市学生比例是指每所学校中城市户口学生的比例，这两个变量都是取值范围为 0—1 的连续变量。学校质量排名是校长报告的本校在当地区县县的排名，取值范围 1—3 分别表示中等及以下、中上和最好三类学校；学校区位是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分为两类，1 表示中心城区学校，0 表示边缘城区、城乡接合部或乡镇农村学校。

###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学生特征变量和学校特征变量。其中，学生特征变量有性别（男生 = 1）、兄弟姐妹数、迁移状态（迁移 = 1）、家庭结构（与双亲居住 = 0，单亲或留守 = 1）、年级（九年级 = 1）、同辈群体<sup>①</sup>、自评健康（家长报告的孩子身体健康状况，健康 = 1）、父母教育期望、家长监督<sup>②</sup>、亲子互动<sup>③</sup>以及是否参加课外补习

① CEPS 设置量表询问被调查者好朋友的积极表现（成绩优良、学习刻苦、想上大学）和消极表现（违反校纪、经常上网吧或游戏厅、退学）情况，每道题目对应三个选项（1 代表没有这样的，2 代表少数这样的，3 代表很多这样的）。我们将三类积极表现加总，获得一个“积极同辈得分”变量，将三类消极表现加总，得到一个“消极同辈得分”变量，然后将前者除以后者，建构了一个“同辈群体质量”变量，数字越大表明同辈群体质量越高。

② CEPS 设置量表询问学生家长在作业考试、在校表现、按时上学、按时回家、朋友交往、穿着打扮、上网时间和看电视时间等八个方面的管教严格程度，每道题目对应三个选项（1 代表不管，2 代表管但不严，3 代表管得很严）。加总后可得到取值为 8—24 的连续变量，数字越大表示家长管得越严。

③ CEPS 设置量表询问家长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情和孩子的烦恼，每道题目对应三个选项（1 代表从不，2 代表偶尔，3 代表经常），加总后可得到取值为 5—15 的连续变量，数字越大表示亲子互动频率越高。

(是 = 1)。学校特征变量有生师比、教师本科比、对数生均拨款和学校硬件设施<sup>①</sup>。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体层次变量 (样本量 = 18979)				
文化资本	53.06	23.92	0	100
学业成就	48.43	15.10	0	100
认知能力	9.98	3.75	0	22
考试成绩	241.40	72.88	17	438.75
课程接受能力	7.31	1.99	3	12
家长职业地位 (高职业地位 = 1)	0.21	0.41	0	1
家长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学历 = 1)	0.18	0.38	0	1
家长受教育年限	10.43	3.31	0	19
政治身份 (党员 = 1)	0.12	0.32	0	1
学生户口 (城市 = 1)	0.45	0.50	0	1
性别 (女生 = 1)	0.98	1.00	0	2
兄弟姐妹数	0.73	0.83	0	6
迁移状态 (迁移 = 1)	0.17	0.38	0	1
家庭结构 (单亲或留守 = 1)	0.30	0.46	0	1
年级 (九年级 = 1)	0.47	0.50	0	1
同辈群体	0.96	0.27	0.14	1.29
健康状况 (健康 = 1)	0.75	0.43	0	1
家长教育期望	16.78	3.30	7	22
家长监督	18.96	3.23	8	24
亲子关系	11.34	2.64	5	15
课外补习 (参加 = 1)	0.33	0.47	0	1
学校层次变量 (学校数 = 112)				
生师比	12.26	4.57	3.44	33.2
教师本科比	0.74	0.29	0	1

① CEPS 设置量表询问校长学校实验室、电脑教室、图书馆、音乐室、学生活动室、心理咨询室、餐厅、运动场、体育馆和游泳池等十类设施的配备和运转情况，每道题目对应三个选项（1 代表没有，2 代表有但是设备有待改善，3 代表有且设备良好），加总后可得到取值为 10—30 的连续变量，数字越大表示学校的硬件设施越完善。

续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数生均拨款	6.39	1.59	0	8.26
学校设施	20.94	4.00	12	30
学校中间阶层比例	0.21	0.18	0.01	0.82
学校城市学生比例	0.45	0.28	0.07	0.99
学校质量排名				
排名中等及以下	0.19	0.39	0	1
排名中上	0.58	0.49	0	1
排名最好	0.23	0.42	0	1
学校区位 (中心城区 = 1)	0.38	0.49	0	1

### (三) 分析步骤和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估计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由于 CEPS 的数据结构是多层次的（个体学生嵌套于学校），我们使用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设定，第一层是个体学生，第二层是学校。考虑到不同学校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同一学校内部学生相对较高的同质性，而且学校的各种特征都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因此我们使用学校固定效应模型（school fixed-effects model）进行统计估计，以控制全部学校之间的异质性。模型的公式为：

$$y_{ij} = \beta_1 Culture + \sum_{k=2}^n \beta_k X_{kij} + \alpha_j + \varepsilon_{ij} \quad (1)$$

公式（1）中  $y_{ij}$  是指第  $j$  所学校第  $i$  个学生的学业成就； $\beta_1$  是文化资本的系数，我们预期它为正数以表示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存在正效应； $X_{kij}$  指代第  $j$  所学校第  $i$  个学生的第  $k$  个个体层次的控制变量； $\beta_k$  是第  $k$  个个体层次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alpha_j$  是每所学校的固定截距，它将所有的学校异质性纳入其中； $\varepsilon_{ij}$  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第二部分通过交互模型估计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效应的阶层异质性。我们同样使用学校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公式为：

$$y_{ij} = \beta_1 Culture + \beta_2 X + \beta_3 Culture \cdot X + \sum_{k=4}^n \beta_k Z_{kij} + \alpha_j + \varepsilon_{ij} \quad (2)$$

公式（2）中  $y_{ij}$  是指第  $j$  所学校第  $i$  个学生的学业成就； $\beta_1$  是文化资本的系数；

$\beta_2$  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X$  ( $X$  指家长职业地位、家长教育程度、政治身份或学生户口) 的系数;  $\beta_3$  是文化资本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交互项的系数;  $Z_{kij}$  是第  $k$  个个体层次的其他控制变量,  $\beta_k$  是对应的回归系数;  $\alpha_j$  是每所学校的固定截距;  $\varepsilon_{ij}$  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第三部分通过交互模型估计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效应在学校间的异质性, 也就是估计学校类型变量 (学校层次变量) 与文化资本交互项的系数。由于学校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任何学校层次变量的系数, 因此这一部分我们使用学校随机效应模型 (school random-effects model) 进行统计估计。同时, 考虑到学校其他特征对学业成就的可能会产生影响, 模型中将加入若干学校层次的控制变量。模型的公式为:

$$y_{ij} = \beta_0 + \beta_1 Culture + \beta_2 X + \beta_3 Culture \cdot X + \sum_{a=1}^n \zeta_a Z_{aij} + \sum_{b=1}^m \eta_b W_{bj} + u_j + \varepsilon_{ij} \quad (3)$$

公式 (3) 中  $y_{ij}$  是指第  $j$  所学校第  $i$  个学生的学业成就;  $\beta_0$  是截距项;  $\beta_1$  是文化资本的系数;  $\beta_2$  是学校类型变量  $X$  ( $X$  指学校中间阶层比例、学校城市学生比例、学校质量排名或学校区位) 的系数;  $\beta_3$  是文化资本与学校类型变量交互项的系数;  $Z_{aij}$  是第  $a$  个个体层次的控制变量;  $\zeta_a$  是对应的回归系数;  $W_{bj}$  是第  $b$  个学校层次的控制变量,  $\eta_b$  是对应的回归系数;  $u_j$  是每所学校的随机截距, 它是一个均值为 0 且等方差随机变量, 与其他所有自变量保持独立;  $\varepsilon_{ij}$  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 五、数据分析

### (一) 文化资本存量的阶层差异

首先通过直方图 (图 1) 考察文化资本存量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的差异。图 1 表明,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子女的文化资本存量存在明显差异。职业地位较高、教育程度较高以及拥有党员身份的家长, 他们的子女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 另外, 城市户口的学生比农村户口学生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

为了更加准确地揭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资本存量的净影响, 我们使用学校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模型 1 仅包含控制变量, 模型 2 则在模型 1 基础上增加了家长职业地位、家长教育程度、家长政治身份以及学生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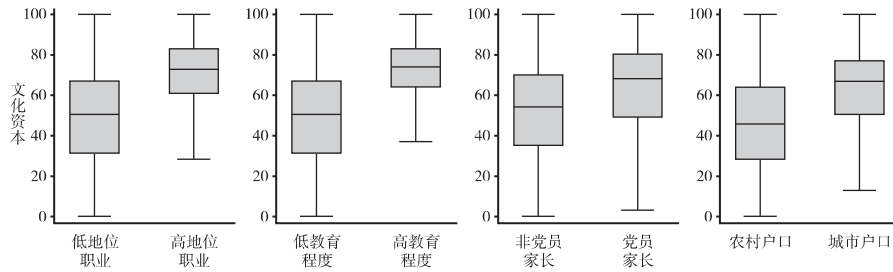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文化资本存量差异

口这四个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模型 2 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四个变量的系数都为正数且都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学生文化资本的存量越多，这与直方图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假设 1 得到验证。此外，模型 1 和模型 2 还表明女生的文化资本多于男生；兄弟姐妹数越多，文化资本越少；单亲家庭或留守的孩子文化资本更少；九年级学生的文化资本少于七年级学生；家长教育期望越高，则文化资本越丰富。

表 2 估计文化资本存量影响因素的学校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家长职业地位 (高职业地位 = 1)		5.037 *** (0.390)
家长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学历 = 1)		4.531 *** (0.438)
政治身份 (党员 = 1)		2.294 *** (0.414)
学生户口 (城市 = 1)		3.210 *** (0.314)
性别 (女生 = 1)	0.558 *** (0.128)	0.576 *** (0.126)
兄弟姐妹数	-1.938 *** (0.182)	-1.245 *** (0.180)
迁移状态 (迁移 = 1)	-1.832 *** (0.388)	-0.398 (0.387)
家庭结构 (单亲或留守 = 1)	-3.375 *** (0.301)	-2.837 *** (0.296)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年级 ( 九年级 = 1)	-2. 593 *** ( 0. 258)	-2. 398 *** ( 0. 253)
家长教育期望	0. 701 *** ( 0. 040)	0. 609 *** ( 0. 040)
常数项	44. 730 *** ( 0. 743)	41. 650 *** ( 0. 746)
组间变异	14. 53	12. 79
组内变异	17. 44	17. 09
Log-likelihood	-81129. 80	-80736. 22
样本量	18979	18979

注: 显著性水平: \*  $p < 0. 1$ , \*  $p < 0. 05$ , \*\*  $p < 0. 01$ , \*\*\*  $p < 0. 001$ ;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 (二) 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为了估计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我们设定了嵌套模型,首先在第一个模型中加入影响学业成就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文化资本变量以考察文化资本的净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模型 1 显示,家长职业地位、家长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的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学业成就越高,这与之前一系列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模型 2 加入文化资本变量之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变量系数均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部分通过文化资本影响学业成就。同时,文化资本的系数为正数且在 0. 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具有独立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2 得到验证。另外,模型 1 和模型 2 是学校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学校间的全部异质性。而考虑到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效应可能在不同学校有所不同,我们建立了随机系数模型<sup>①</sup>(模型 3),令文化资本的系数在不同学校发生变化。模型 3 的各个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2 基本一致,同时模型 3 中文化资本系数的方差也显著( $p < 0. 001$ ),说明文化资本的系数在不同学校存在显著差异。

① 在建立随机系数模型之前,我们也建立了学校随机效应模型(随机截距模型)并对这两个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检验结果显示,随机系数模型比随机截距模型能更好地对数据进行拟合。本文省略了随机截距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3 估计文化资本效应的学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家长职业地位 (高职业地位 = 1)	0.780 <sup>**</sup> (0.260)	0.585 <sup>*</sup> (0.260)	0.557 <sup>*</sup> (0.260)
家长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学历 = 1)	2.447 <sup>***</sup> (0.291)	2.272 <sup>***</sup> (0.292)	2.230 <sup>***</sup> (0.291)
政治身份 (党员 = 1)	0.541 <sup>*</sup> (0.275)	0.453 <sup>+</sup> (0.274)	0.387 (0.274)
学生户口 (城市 = 1)	0.205 (0.209)	0.064 (0.209)	0.065 (0.208)
性别 (女生 = 1)	1.050 <sup>***</sup> (0.086)	1.051 <sup>***</sup> (0.086)	1.048 <sup>***</sup> (0.086)
兄弟姐妹数	-0.501 <sup>***</sup> (0.120)	-0.462 <sup>***</sup> (0.119)	-0.503 <sup>***</sup> (0.119)
迁移状态 (迁移 = 1)	0.206 (0.257)	0.212 (0.257)	0.277 (0.255)
家庭结构 (单亲或留守 = 1)	-0.974 <sup>***</sup> (0.197)	-0.872 <sup>***</sup> (0.197)	-0.882 <sup>***</sup> (0.196)
年级 (九年级 = 1)	-2.984 <sup>***</sup> (0.169)	-2.917 <sup>***</sup> (0.169)	-2.879 <sup>***</sup> (0.169)
同辈群体	9.675 <sup>***</sup> (0.342)	9.451 <sup>***</sup> (0.342)	9.479 <sup>***</sup> (0.341)
自评健康 (健康 = 1)	0.668 <sup>***</sup> (0.198)	0.565 <sup>**</sup> (0.198)	0.561 <sup>**</sup> (0.197)
家长教育期望	1.065 <sup>***</sup> (0.027)	1.053 <sup>***</sup> (0.027)	1.051 <sup>***</sup> (0.027)
家长监督	-0.185 <sup>***</sup> (0.029)	-0.201 <sup>***</sup> (0.029)	-0.203 <sup>***</sup> (0.028)
亲子关系	0.363 <sup>***</sup> (0.037)	0.289 <sup>***</sup> (0.038)	0.289 <sup>***</sup> (0.038)
课外补习 (参加 = 1)	1.719 <sup>***</sup> (0.202)	1.574 <sup>***</sup> (0.203)	1.626 <sup>***</sup> (0.202)
文化资本		0.046 <sup>***</sup> (0.005)	0.050 <sup>***</sup> (0.007)
常数项	19.807 <sup>***</sup> (0.723)	19.105 <sup>***</sup> (0.726)	18.756 <sup>***</sup> (0.882)
组间变异	6.05	5.74	5.29 <sup>***</sup>
组内变异	11.35	11.32	11.29 <sup>***</sup>
文化资本系数方差	—	—	0.002 <sup>***</sup>
Log-likelihood	-72965.66	-72923.95	-73169.57
样本量	18979	18979	18979

注：显著性水平：<sup>+</sup>  $p < 0.1$ ，<sup>\*</sup>  $p < 0.05$ ，<sup>\*\*</sup>  $p < 0.01$ ，<sup>\*\*\*</sup>  $p < 0.001$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三) 文化资本效应的阶层异质性

我们在表 3 模型 2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文化资本与家长职业地位、家长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和学生户口的交互项,以考察文化资本的效应是否存在阶层异质性,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 1 显示,文化资本与家长职业地位的交互项系数为正数 ( $p < 0.001$ ),说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在家长职业地位较高的学生中更明显。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文化资本得分每提高 1 分,低职业地位的学业成就提高 0.04 分,而高职业地位的学业成就提高 0.083 分 ( $0.04 + 0.043 = 0.083$ )。因此高职业地位家长的子女更能从文化资本的增加中受益。假设 3a 得到验证。同理,模型 2 中文化资本与家长教育程度的交互项系数也是正数 ( $p < 0.001$ ),说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在家长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中更显著。假设 3b 得到验证。类似地,模型 3 中文化资本与政治身份的交互项,以及模型 4 中文化资本与学生户口的交互项也均为正数且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在党员家长和城市户口学生中更显著,假设 3c 和假设 3d 也得到验证。

表 4 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效应的阶层异质性 (学校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文化资本	0.040 *** (0.005)	0.041 *** (0.005)	0.042 *** (0.005)	0.031 *** (0.006)
高职业地位家长	-2.249 ** (0.795)	0.558 * (0.260)	0.549 * (0.260)	0.522 * (0.260)
高教育程度家长	2.141 *** (0.293)	-1.067 (1.009)	2.204 *** (0.292)	2.102 *** (0.293)
中共党员家长	0.446 (0.274)	0.445 (0.274)	-2.156 ** (0.750)	0.436 (0.274)
城市户口学生	0.079 (0.209)	0.080 (0.209)	0.062 (0.209)	-1.987 *** (0.469)
文化资本 × 高职业地位家长	0.043 *** (0.011)			
文化资本 × 高教育程度家长		0.048 *** (0.014)		
文化资本 × 中共党员家长			0.043 *** (0.012)	
文化资本 × 城市户口学生				0.039 *** (0.008)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项	19.483 *** (0.733)	19.375 *** (0.730)	19.380 *** (0.729)	19.824 *** (0.740)
组间变异	5.76	5.77	5.74	5.73
组内变异	11.32	11.32	11.32	11.32
Log-likelihood	-72916.79	-72917.93	-72916.91	-72911.92
样本量	18979	18979	18979	18979

注：(1)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兄弟姐妹数、迁移状态、家庭结构、年级、同辈群体、自评健康、家长教育期望、家长监督、亲子关系、课外补习。(2) 显著性水平：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文化资本效应的阶层异质性，我们根据表 4 的四个交互模型的结果绘制了学业成就对文化资本的回归线图，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所有回归直线的斜率都为正，说明对所有学生而言，文化资本的提高都有助于学业成就的提高，但是不同家庭的提高程度有区别。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亦即家长职业地位较高、教育程度较高、拥有党员身份的家庭以及拥有城市户口，学生不但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如图 1 和表 1 所示），而且文化资本对他们学业成就的提升作用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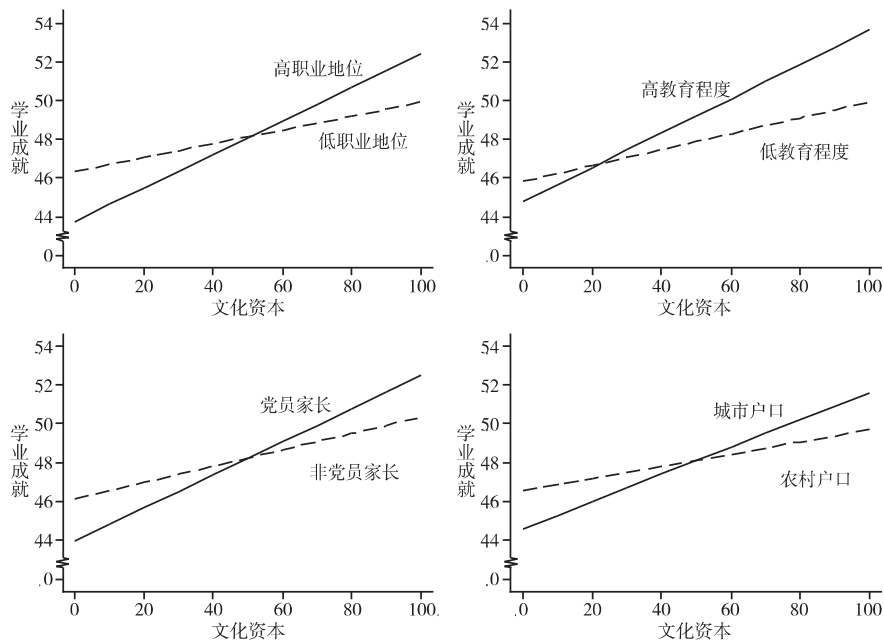


图 2 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效应的阶层异质性

(四) 文化资本效应的学校间异质性

本小节第二部分的随机系数模型表明，文化资本的效应在不同学校确实存在差异。这一部分，我们根据随机系数模型估计出每所学校文化资本的系数，然后考察文化资本系数与学校中间阶层比例和学校城市学生比例这两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横坐标为学校中间阶层比例（或学校城市学生比例）、纵坐标为文化资本系数的坐标系中绘制所有学校文化资本系数的散点，然后对这些散点进行直线拟合，结果如图3所示。图3左半部分表明，随着学校中间阶层比例的提高，文化资本的系数总体上也相应提高；而右半部分表明，随着学校城市学生比例的提高，文化资本的系数总体上也相应提高。说明文化资本的效应存在学校间异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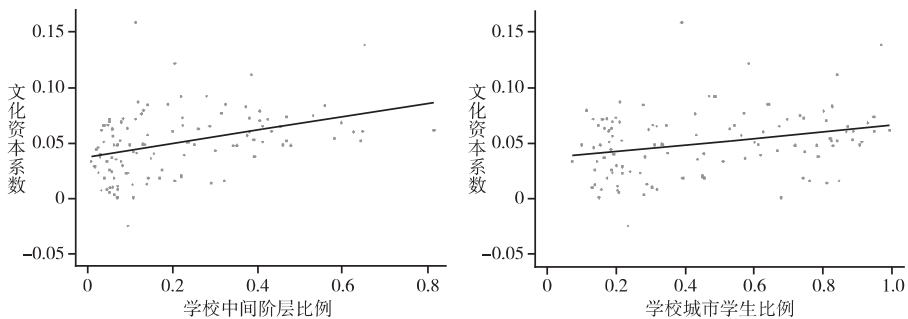


图3 文化资本系数的学校间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学校间异质性，我们采用与上一部分相似的策略，在模型中分别加入文化资本与学校中间阶层比例、学校城市学生比例、学校质量排名和学校区位的交互项，使用学校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显示，文化资本与学校中间阶层比例的交互项系数为正数（ $p < 0.001$ ），说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四个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在中间阶层比例更高的学校更明显。具体而言，中间阶层家长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文化资本的效应就增加0.001。假设4a得到验证。同理，模型2中文化资本与学校城市学生比例的交互项系数也是正数（ $p < 0.001$ ），说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在城市学生比例更高的学校更显著，假设4b得到验证<sup>①</sup>。模型3中文化

① 表5模型1和模型2（交互模型）假定文化资本的系数是精英阶层比例或城市学生比例的线性函数，而绘制图3所用的随机系数模型则不作这种假定，直接估计各个学校的文化资本系数。而当我们把估计出来的文化资本系数对中间阶层比例或城市学生比例做回归时会发现，二者关系可以很好地用直线进行拟合。因此交互模型与图3呈现的结果是一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资本与学校质量排名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均为正数 ( $p < 0.001$ )，说明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在质量更好的学校更明显。特别地，在排名中等及以下的学校，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没有影响（文化资本的系数不显著），而在排名中上的学校，文化资本的效应为 0.049，在排名最好的学校中，文化资本的效应更大，为 0.058，假设 4c 得到验证。模型 4 中文化资本与学校区位的交互项同样为正数且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资本的正效应在中心城区学校更大，假设 4d 得到验证。

表 5 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效应的学校间异质性（学校随机效应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高职业地位家长	0.691 ** (0.254)	0.717 ** (0.253)	0.724 ** (0.253)	0.731 ** (0.253)
家长受教育年限	0.259 *** (0.036)	0.259 *** (0.036)	0.259 *** (0.036)	0.260 *** (0.036)
文化资本	0.026 *** (0.007)	0.023 ** (0.009)	0.004 (0.010)	0.034 *** (0.006)
学校中间阶层比例	9.086 (5.915)	15.959 ** (5.531)	16.295 ** (5.567)	16.123 ** (5.521)
学校城市学生比例	-6.029 + (3.481)	-9.176 * (3.581)	-6.221 + (3.475)	-6.025 + (3.444)
排名中上学校	1.108 (1.168)	1.085 (1.157)	-1.248 (1.301)	1.095 (1.156)
排名最好学校	1.950 (1.679)	1.983 (1.663)	-0.993 (1.866)	1.897 (1.661)
中心城区学校	1.761 (1.283)	1.747 (1.271)	1.676 (1.280)	-0.141 (1.384)
文化资本 × 学校中间阶层比例	0.113 *** (0.029)			
文化资本 × 学校城市学生比例		0.055 ** (0.018)		
文化资本 × 排名中上学校			0.049 *** (0.012)	
文化资本 × 排名最好学校			0.058 *** (0.015)	
文化资本 × 中心城区学校				0.033 *** (0.010)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常数项	8.937* (3.537)	9.353** (3.517)	9.832** (3.543)	8.509* (3.498)
组间变异	4.626*** (0.322)	4.581*** (0.319)	4.616*** (0.322)	4.575*** (0.319)
组内变异	11.315*** (0.058)	11.318*** (0.058)	11.314*** (0.058)	11.317*** (0.058)
Log-likelihood	-73162.08	-73165.02	-73159.41	-73164.10
样本量	18979	18979	18979	18979

注：(1) 控制变量包括：政治身份、学生户口、性别、兄弟姐妹数、迁移状态、家庭结构、年级、同辈群体、自评健康、家长教育期望、家长监督、亲子关系、课外补习以及学校层次变量（生师比、教师本科比、对数生均拨款、学校硬件设施）。(2) 显著性水平：\*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最后，我们根据表 5 模型 3 和模型 4 绘制了不同排名和不同区位学校的学业成就对文化资本的回归线图。图 4 的两幅图显示，无论是在排名中上还是在排名最好学校，文化资本的提高都有助于提升学业成就，但是排名最好的学校文化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大；无论在中心城区学校还是边缘城区或乡镇学校，文化资本的提高都有助于提升学业成就，但是在中心城区学校，文化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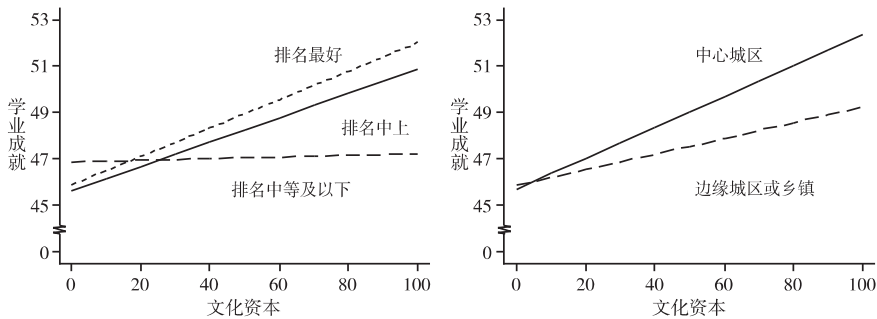


图 4 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效应的学校间异质性

## 六、结论与讨论

文化资本是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阶层再生产的关键。在使用文



化资本理论解释学业成就阶层差异的经验研究脉络中诞生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在高阶层和优质学校中更大，二是认为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正效应在低阶层和非优质学校中更大。本文讨论了在中国社会中文化资本的回报在家庭和学校间的异质性问题，以此回应了文化资本异质性的理论分歧。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 学年基线数据，本研究发现：（1）当前学生文化资本的结构存在明显的阶层化特征，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出身的孩子具备越丰富的文化资本；（2）文化资本有助于提升学业成就，文化资本存量越多的学生，学业成就越高；（3）文化资本的回报存在阶层差异，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文化资本对提升学业成就的作用更大；（4）文化资本的正效应还存在学校差异，文化资本在优质学校中的回报高于非优质学校。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再生产模型比文化流动模型更适合解释当前中国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前我国阶层结构存在明显分化，越是在这样分化而且竞争激烈的场域中，文化资本就越作为经济资本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区隔方式凸显出其重要性。在当前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凭借其在资本存量方面的优势，不仅可以帮助子女积累更多文化资本，而且可以有效地将文化资本转换为学业成就。不仅如此，学校系统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不平等。在高阶层学生聚集的优质学校中，文化资本可以得到更多的学业成就回报，且这种作用独立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因此我们认为文化资本在中国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再生产”，家庭环境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第一重再生产，学校系统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第二重再生产。

本文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理论，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质量相结合讨论了文化再生产，并且发现了文化资本的双重再生产现象。研究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阶层分化加剧，而且学校也因教育资源、教育理念和实践明显分化的国家，文化资本将会扩大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优势。这就使得我国未来的社会分层结构暗藏着阶层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固化的风险。特别是学校系统与家庭背景的勾连，强化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削弱了学校原本应该承担的平等器（equalizer）的作用。要缓解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则需要完善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内的各种制度设计，缩小学校间在阶层构成方面的差异，阻止文化资本分布结构的阶层不平等在学校环境中进一步扩大。

## 参考文献:

- 仇立平、肖日葵, 2011,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方长春、风笑天, 2008, 《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义务教育中的阶层差异研究》, 《浙江社会科学》第8期。
- 葛新斌、李罡, 1998, 《我国学校与考试关第的历史考察: 兼议“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问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3期。
- 胡安宁, 2017, 《文化资本研究: 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 《社会科学》第1期。
- 李路路、秦广强等, 2016, 《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欣, 2007,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陆学艺,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愈晓、黄超, 2016, 《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杨东平, 2016, 《基础教育之问: 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重新认识应试教育》,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期。
- Alexander, K. L. , D. R. Entwisle & L. S. Olson 2007, “Lasting Consequences of the Summer Learning Gap.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 2) .
- Andersen , I. G. & M. M. Jæger 2015, “Cultural Capital in Context: Heterogeneous Returns to Cultural Capital across Schooling Environments.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0.
- Aschaffenburg , K. & I. Maas 1997,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 4) .
- Baumert J , G. Nagy & R. Lehmann 2012, “Cumulative Advantages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and Ethnic Inequality: Matthew Effects in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within Elementary Schools?” *Child Development* 83 ( 4) .
- Bourdieu , P & Jean-Claude Passeron 1977 ,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ourdieu , P. & L. J. D. Wacquant 1992 ,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 P.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 In Jerome Karabel & A. H. Halsey ( eds. ) ,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 In J. G. Richardson ( ed. ) ,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wles , S. & H. Gintis 1976 ,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yun , S. Y. , E. Schofer & K. K. Kim 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 ( 3) .
- DeGraaf , N. D. , P. M. DeGraaf & G. Kraaykamp 2000,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
- DiMaggio , P. J. & J. Mohr 1985, “Cultural Capital ,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and Marital Selec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 DiMaggio, P. J. & M. Useem 1978, "Social Class and Arts Consumptio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Class Differences in Exposure to the Arts in America." *Theory and Society* 5.
- DiMaggio, P. J.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 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 Downey, D. B., P. T. V. Hippel & B. Broh 2004, "Are Schools the Great Equalizer? School and Non-School Sources of Inequality in Cognitive Skil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 (5).
- Dumais, S. A. 2002,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
- 2006, "Early Childhood Cultural Capital, Parental Habitus, and Teachers' Perceptions." *Poetics* 34.
- Gamoran, A., & R. D. Mare 1989, "Secondary School Tracking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Compensation, Reinforcement, or Neutr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5).
- Katsillis, J. & R. Rubinson 1990, "Cultural Capital, Student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al Reproduction: The Case of Gree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 Lamont, M. & A. Lareau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6 (2).
- Lareau, A.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eletto, L. & F. Andrade 2014,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f Brazilian Adolesce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7 (1).
- Oakes, J. 1985, *Keeping Track: How Schools Structure Inequa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otter, D. & D. S. Morris 2016, "Family and Schooling Experiences in Racial/Ethnic Academic Achievement Gaps: A Cumulative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60.
- Raudenbush, S. W. & R. D. Eschmann 2015, "Does Schooling Increase or Reduce Social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1).
- Robinson, R. V. & M. A. Garnier 1985, "Class Reproduction among Men and Women in France: Reproduction Theory on Its Home Groun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Swartz, 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u, Y. 2008, "Cultur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 - 1996."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1 (1).
- Xu, J., & G. Hampden-Thompson 2012, "Cultur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Mobility, Cultural Resources, or Trivial Effec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6 (1).
- Yamamoto, Y. & M. C. Brinton 2010,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Jap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3 (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吴莹

---

**PAPER**

The Dual 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A Heterogeneous Discussion about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Capital

..... *Wu Yuxiao ,Huang Chao & Huang Suwen* 1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 2013 – 2014)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s of cultural capital on the middle-school students’ school achievement among the stratified families and schools in China. It shows that students from families of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possess more cultural capital; meanwhile ,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ultural capital tend to be bigger in high-quality schools than those in low-quality one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rather than Cultural Mobility Model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e argue that cultural capital may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structure of status attain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Pedigree of Entrepreneurs and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 *Li Guowu & Wang Zhenjie* 28

**Abstract:** Does a university or enterprise pedigree of the entrepreneur contribute to more possibilities for him/her to obtain venture capital? Based on the status signals theory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s the uncertaint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 the entrepreneurial popularity as an organization where an entrepreneur comes from can affect the external investors’ perceptions of his quality , and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ratio for the entrepreneur to obtain venture capital at the early stage. Our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both the entrepreneurial popularity and the university pedigree of the entrepreneur are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for the entrepreneur in attracting angel investors or A-round venture capital. However , the influ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edigre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university pedigree of the entrepreneur.